

Alain Bosquet

Une mère russe 我的俄国母亲

【法国】

阿兰·博斯凯 著
郑永慧 边 芹 译

法国当代
文学名著

风雨人生
亲情地狱



译林出版社



170352

L65, v.5
4342

我的俄国母亲

【法国】阿兰·博斯凯 著

郑永慧 边芹 译

该书荣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京电力大 00203817

译林出版社



Alain Bosquet
Une mère russe

根据 Grasset 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
国际中文版授权: 法国 Grasset 出版社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给予协助, 谨致谢意

我的俄国母亲

[法国] 阿兰·博斯凯著 郑永慧 边芹译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地址: 江都路 44 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06 千
版次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706-9/I·404
定 价 11.0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责任编辑: 韩沪麟

献给有俄罗斯母亲的
小说家：鲍里斯·施雷贝

贝尔特·杜里扬斯基于1889年生于敖德萨，父亲是一个犹太人，以贩卖毛皮和皮革为业。她跟随贾夏·埃费茨的老师莱奥波德·奥埃尔学小提琴。她的第一次婚姻短暂而不幸，在1918年，内战正酣的时候，城市数度易手，她嫁给了亚历山大·比斯克，他是个有愿望而无行动的有钱人。生活潇洒，业余爱写诗，出生于一个阿尔萨斯人和比利时人结合的家庭，他家于十九世纪中叶到乌克兰来修建铁路。

贝尔特·比斯克成功地把她的丈夫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手中救了出来；她马上离开俄国，先到保加利亚，后到比利时。1940年，她又重新踏上流亡的道路，先在法国南部住了一段时期，不久就到美国去。亚历山大·比斯克在美国完全脱离了时代，满足于作买卖稀有邮票的生意。贝尔特晚年当上了雕塑家亚历山大·阿尔奇潘科的学生，成为一个忠心耿耿的妻子，和一个等待着儿子不定期来探访的母亲，她的儿子就是本书情节的叙述者。她的丈夫悲惨地死去以后，她到巴黎来度过晚年，于1977年故世。

巴黎,1976年10月

“你死了,我的母亲,我觉得一身轻松。”

有一天,我同你无端端地吵了一架,我心中突然涌现了这句惊心动魄而且十分恶毒的诗句;在吵架中许多误会从喉咙到嘴唇,有意的和无意的,一下子倾倒出来;像泥石流的石头一样。天气很冷,巴黎的风像萧瑟秋天般阴沉,吹刮在红棕色的大地和朦胧的天空之间,天上的云层像半醉的母牛在那里推推搡搡。我觉得格雷内尔街上的橱窗,然后是圣-多米尼克街上的橱窗,都又窄又难看,就像我们的母子关系一样:母亲恼火,儿子失去了耐心。我真想在这条潮湿的人行道上,或者用脚踏碎一只从铺面里飞出来的果子:一只橙,一只发育不良的苹果,一只笨头笨脑的香蕉;或者买一件随便什么东西,也许是一件毫无美感的玩具:是呀,一个不会买给自己钟爱的孩子的玩偶,我会当着行人的面挖出它的塑料眼珠,挖出它的白色泡沫塑料内脏。我也真想打那些近在我身边,身体不如我强壮或者年纪比我老迈的人的耳光:身体虚弱应受到永远的惩罚,对弱者是不能宽恕的。我对我的大发脾气并不想找任何借口: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应该,可是我想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这种状态,一直到我走到残废军人院为止。我对你感到失望,对自己也感到失望,只有一种补偿办法,就是对巴黎感到

失望。

我十分欣赏我的那句小诗，我觉得它完美无缺：它抑扬顿挫得法，音调铿锵，满不在乎的态度无可非议，丧母之痛在别人身上可引起多种后果。这一切是文学意味太重了吧？我生平的大事，除了求助于文学，我还能求助于什么呢？我把这句倒霉的诗句写出来以后，立刻费尽气力，把它忘记掉；这样一来反而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中。起初，我在轻雾中高声把它朗诵出来：响声像塞了棉花似的瓮声瓮气，尖锐而且有点虚伪。我挑选了第一个过来的路人：她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平凡而憔悴，穿得不好不坏，中等人家出身，可能是社会福利员或者某个市立机构的保管员；眼珠很灵活，额头很高，仿佛要驱走外表上的羞怯。我挡住她的去路，时间只有两三秒钟，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她说：

“你死了，我的母亲，我觉得一身轻松。”

她的脸上流露出犹豫不决，我以为她要耸耸肩膀，很严厉地瞪我一眼，或者一挥手，仿佛要摆脱什么。我脸上迟疑的表情也太明显了，那妇女不慌不忙地转过身去，一句话也不说就走远了。这件事激发了我的兴趣，我决心将那句可怕的诗句去处罚第二个过路人，因为诗句里面丑恶而灾难性的形象，正在重重地压在我心上。行动必须迅速，就好像要卸下重压，将纠缠着我的负疚感，挪到别人身上。向我走过来的先生穿着一件优质大衣，一顶可以算得上漂亮的帽子，唇上的小胡子丝毫不显得可笑；他的年纪同我相仿，举止不失为潇洒。我无法掩饰我的不安，我说：

“对不起。你死了，我的母亲……”

“先生，我很忙。”

他轻轻地碰了碰我的手肘，毫不犹豫地用力推开我。我当时十分慌乱。我看见对面人行道上有一个五六岁的男童，戴着一顶显得太大的鸭舌帽，我穿过马路，抓住他的肩膀：

“你死了，我的母亲，我觉得一身轻松。”

他用既觉得好玩又带点惊讶的眼光望着我，递给我一个五颜六色的弹子。我抓住他的粗羊毛短上衣的袖子，把他摇了摇。他怯生生地说出几句简单的话来：

“你还想要一颗薄荷糖吗？上星期妈妈病了。爸爸说她不会死的。”

我的心情稍为平静一点。没有人愿意听我的警句。从今以后我只好抱着诗句活下去。我还谴责我的想象力，谴责三十多年来我无法改正的习惯作法：把我内心的一切，最终变成发音清晰的句子表达出来。为了散散心，我可以在一间咖啡馆里喝些饮料，或者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让他向我倾诉他自己的苦恼。我虽然不情愿，也只好把这份语言毒药埋藏在自己的心里，作为一种惩罚，我必须服下这份毒药。我紧紧抓住现实：你已经过了八十七岁，你的肉体和精神都日益衰退，我敢肯定或者大概肯定你过不了这个冬天。我求助于所有办法，其中理智只占很小一部分。我要怎样做才好呢？为了不屈服于上千种互相矛盾的冲动，我应该对你采取一种清楚明白而有效的态度。意志和决心比任何时候都要取代感情。我又重新采取几年前我已经采取过的决定：我尽力使你自己同你分离，在内心深处我对自己说，你再也不是我过去多么热爱过的你了。你外表上还是我母亲，而实际上你已经不是了。这样我对你的日益衰弱也许会感到好受一些。

我陷入理论研究中了，这就产生一种危险：使我的本来平

衡的神经系统,经受多种多样意想不到的震动。我加快脚步,确信我那愚蠢的诗句有点轻率、失礼和缺少开玩笑的味道,说什么:

“你死了,我的母亲,我觉得一身轻松。”

为诗句而苦恼,岂不是等于抽掉了诗中包含的真理?我渐渐地对好和坏的区分变得无动于衷了。我既不选择好也不选择坏,因为我曾先后当过它们的牺牲品。我走到嘉布遣大街一间新开张的电影院前面,走了进去,影片的平庸最低限度可以使我散散心,换句话说,就是使我的灵魂在短期内脱离我的躯体。

经过我这句小诗的打击以后,你还有四个月好活。

洛姆·帕兰卡,1924年夏

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幕非常鲜明。我们在既绿又蓝的多瑙河畔,在保加利亚的洛姆·帕兰卡那边。漂亮的白色船舶带着快活或者嘲弄的神气,喷出来的烟首先抚摸龙骨和救生艇,然后散布在码头上的树丛中。我捡了几块又黄又滑的卵石,握在手掌里感觉非常舒服。你对我说只要保留两三块就够了,它们会划破我的衣袋的。你告诉我说这条河十分长,穿过好几个国家,有些国家的名字是全新的,好像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我试着要记住这两个名字,你不得不为我重

复了好几次。我的父亲亚历山大对四岁半的我比你更觉得厌烦,因为我既不是玩偶了,可还不是一个可以用普通语言而不是用儿童语言与之对话的人。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他不得不再为我上一节当代历史课:打了好几年的仗,死了许多人,最后战争以和解而结束,在法国凡尔赛订了约,签了字。好人得到好报,坏人受到惩罚。许多帝国和王国消失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领土上建立了独立的国家。

你笑了。你补充说我要经过其中一些地方,它们都是十分美丽的。轮船要带着我们,我的父亲和我,到很远的地方去,我要看到两座有名的城市:布达佩斯和维也纳。我到的那地方不要上学,只会见到外公和外婆,他们都十分爱我。再过一些日子,我就会学到许多有趣的东西,最后我会在一个十足文明的国度里长大。我没有提出多少问题,一心只想着衣袋里的卵石。同时也考虑到晕船,那是我在一则寓言里发现的。你安慰我说,在内河上,即使像眼前这条宽大的河流,也从来不会有失去平衡的感觉。我的父亲利用母亲的这句话,顺便教会我什么叫“激浪”和“前后颠簸”,我觉得很有趣;看见我高兴得那么厉害,他又加上一个“左右摇动”。好一会儿,我对航海真正向往,以致我问自己,以后要不要当海员。你为了我对父亲千叮嘱万叮嘱:在船上,我应该多穿些衣服,要避开穿堂风,不要同那些不讲礼貌的孩子交往。到了布鲁塞尔,父亲应该拥抱双亲。你有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们了。你重复说了好多遍:父亲会想念你的。这次趁船旅行,在他最近意气消沉以后,对他大有好处。他工作过度,从来没有想到要迁居异地。现在起码能使他感到安慰的是,他可以带儿子远离这个不可靠的国土,这里的语言多么难听;你为我梦寐以求的第一件

事,就是受到欧洲教育。我的外祖父母交游甚广,而且拥有无可怀疑的道德处方。

轮船的乘客渐渐多起来,不久离别的时间就到了。你同我的父亲走开去片刻,留下我独自一人同我的战利品。许多一本正经的先生们带着行李到了,他们不停地点数行李。马车夫们不住地敬礼。在他们的谈话中,我发觉除了保加利亚语以外,还有些片言只语是俄语和法语。穿着有金线饰带白制服的男人向乘客们敬礼。他们提请妇女们注意,不要让鞋跟嵌进一条过陡舷梯的两块木板中间。贵重的小狗到处乱钻,乱吠,被人责骂。在二层甲板上,一个小乐队正在演奏一曲华尔兹,你搂住我父亲的腰,他抬起一络黑发,而你呢,你摇动金黄色的发环,我知道你有时在早上用双氧水使发环变白,你们用嘴接吻,我不得不像往常一样,把眼光挪开去。

乐队里的小提琴疯狂般演奏,简直可以说它们自己在弦上滑动,发出猫叫似的声音,扭歪了乐师们的手指。我的父亲对你说,作为职业音乐家,你应该对这种低级趣味的疯狂演奏感到气愤。你回答说,对恰尔达什舞的演奏不必太认真。我问你什么叫恰尔达什舞,我不认识这个词;我尽力把它念出来,还答应你记住这个词以丰富我的词汇。许多先生拿着有球柄的手杖和草帽,他们摆弄草帽就像在马戏团里摆弄盆子一样。妇女们的裙子很短,帽子上的短面纱十分复杂。你又一——列举了我和我的父亲在船上应注意的事项。我应该留意大便,大便必须有规律而且定时,因为肠胃的富有规律就保证身体发育正常。至于我的父亲,他,应该学会少想一点,应该相信将来就是幸福的同义词。他们把我送去远处是为了我好,我要再过一些日子才能体味到离别的悲痛。你抱吻我,我

有一种印象：你很想对我说些温情的话，可是忽然你说不出来了。倒是我大着胆子喃喃地说：“妈妈，我爱你。”我也不知道是出自习惯或者是出于责任。我的父亲说这是第二次流亡，因为我出生不久我们就离开了俄罗斯，现在我们又要告别保加利亚，这到底是一个好客的国度啊。你怒气冲冲地回答：“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西欧，这才是他长大成人的地方。”

既然我要离开你，我就决定把卵石交给你，你替我保管好，将来再还给我，等我们在那个美丽的国度里相会的时候。你紧紧地拥抱我。我的父亲平素一脸严肃，也许现在他想强调他的严肃性格，又谈起战争来：他认为肢解奥匈帝国没有必要，而德国，尽管犯了许多错误，却仍然是歌德的故乡。我尽力记住这几个名字。告别的情景没完没了。汽笛声响了，我问自己是不是像火车一样：轮船马上要启航，旅客们一秒不差地要赶快上船。我的父亲回答我说：轮船的时刻表执行得不那么严格，多瑙河上的航行是懒洋洋的，而火车即使是个小站，一误点就会带来大祸。穿白制服的人们走向前边，音乐家们离开了甲板。一两只用皮带牵着的鬃毛狗，作了几个漂亮的翻跟斗动作。我的父亲叮嘱你不要忘了小提琴，现在家务由于我们出门而减少了，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拉罗、舒曼和德尔达拉^①身上。你回答说，艺术的确是能给人极大安慰的东西。接着你又十分亲切地告诫我说：“你要写信给我，告诉我你想做什么样的人……你等着瞧，外公会很快就教会你

^① 拉罗(1823——1892)是法国作曲家，舒曼(1810——1856)是德国作曲家，德尔达拉是捷克音乐家。

写字。你应该忘掉俄语。最伟大的语言，是法语。”我很喜欢轮船，可是戴着奇形怪状帽子的太太们叫我害怕，就像我害怕那些小胡子太长的先生们一样。船头上的船名我读不出来：DER WEISSE DONAU。我的父亲告诉我说：那是德文，意思是“白色的多瑙河”。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文字游戏，因为人们都习惯跟着斯特劳斯说多瑙河是蓝色的，实际上多瑙河有时是绿色的，有时是浅棕色的。轮船本身是白色的，它用河流的名字作自己的名字，使颜色同名字相配合。我不知道他的解释对我来说过于复杂，或者他说得不清楚，总之我觉得累了，你又拥抱我和安慰我：卧铺的床很软而且比我的床宽大。我作了个手势，把我最后一块卵石向水面掷去。我相信你揩拭了眼泪，以我孩子的逻辑看来，这是正常的，你同我即将保留在心中的印象相符。

童年的这一幕，我总是不让它受到我自己的嘲笑，也许我甚至花了不少心思尽我所能使这一幕变得平淡自然和熠熠生辉。它已经遥远而且相当模糊了，我却在半个世纪里眷恋着它，把它变成我心目中典型的迷人景象。我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在我身上我用疑心病来克服带点勉强的好斗心理——这一定是我的自卫方法——我想我必须接受我们互相亲爱的一幕。这段美好的时光，我从来不想改变它，攻击它。只为了写成文字，我才不得不带点苦恼去分析它。那天在多瑙河畔，快乐而无忧无虑的，是你吗？我们分离的前几个星期，你们之间并不是没有吵过嘴和闹过别扭。我记得你同我的父亲之间的争执，你悄悄地哭泣；他呢，大声嚷了几声以后，躲到一边赌气，这比他坦率地发怒更叫你害怕。有时房门突然打开，你们中一个人把帽子往脑壳上一按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或者

拿出手提箱，急促地往里面塞了几件女袍，一双鞋子和一只牙刷，几封盖过封印的信，不加掩饰地放在桌子上，然后人走了，一直到深夜才回来。通过一连串神秘而迅速变化的戏剧性手势，我猜到了有丑剧发生。

你对音乐的热情减退已经有好几个月，现在又恢复了，你又练起了小提琴，你甚至拿家用节省下来的一点点钱，买了乐谱。我的父亲眼开眼闭，其实他知道你在蔬菜和肉价上作弊。他肯定也明白你不能满足于他的爱和我的爱。你去参加茶会，在索非亚的市中心，你可以遇见一些白俄和过境的法国人。这一小圈子的人你从来不请他们到家里来，因为我们的家十分简陋。这些人鼓励你当着三四十位听众演出，半小时的美妙音乐使他们回到安逸和充满浪漫色彩的过去。你很有理由庆贺自己的成功。你的朋友鉴于我们家的开支相当紧，发起为我们募捐。得了钱后他们小心翼翼地问你，给我买一只新书包，一件羊毛套衫，玩具，或者上等料子的衣服。我接受这些礼物时态度很自然，我的腼腆使我固定不变地采取同样的态度：我认为我永远不配别人这样关心我。我的父亲不喜欢这一类善举，他在巴黎银行保加利亚分行当译员，他的工资够支付我们的开销；他认为音乐是一种艺术，而不是职业。

他的沉默难道没有别的原因吗？你长得漂亮，好动，迷人。作为一个认真的母亲，你完成任务很坚决，而且有唯恐失去的心理；我的迅速成长可以使你少为我操心一点，哪怕每天两三小时也好。我的存在并不使你感到厌烦，你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因此也越来越难使人激动了。我还认为你在不同你的丈夫疏远的情况下，仍然感到有必要把他同别的男子，或者在智力方面，或者在好色方面，比较一下。在你人生的这段

时期,你是否适应了婚姻生活,随着我深挖这片荒地,我认为我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你们吵架时,我的父亲责骂你无节制地使用香水,尤其是夏内尔五号,在你眼中,夏内尔五号是最高贵的象征。他也不喜欢某些胸部袒露得太厉害的衣服,而且批评你的发型:髻曲的鬓发不适合良家妇女。我站在哪一边?我觉得在我羞怯的内心深处,我经常认为父亲是对的,而你不对。你大概也猜到了,虽然我们之间一句话也没有说。这种情况也发生过不少:为了我一个过分严厉的脸色,或者牢牢地盯住的眼光,你举起手来要打我。手还没有完全举起,你就改变了手势,用胳膊抱住我的小身躯;母爱战胜了你的冲动;我也得出结论,认为我应该受罚,你的无限伟大的爱使我逃脱了。不完全的记忆最能欺骗人,隔了几年,记忆就被歪曲了,或者用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加以补充。在这些记忆中,有一个总是挥之不去,好几次回到我的脑海中。我的父亲和你,你们有一个法国朋友,他一张口就滔滔不绝,随时可以说出一段真的或假的奇闻轶事来;对真的,他总是指天发誓,表明自己的诚意,作些恳求别人相信的手势;对假的他就用右臂一挥,仿佛表示虚构的事实也能消遣,比歪曲真理强。他的名字叫维克托,很明显,你很喜欢他。

维克托每星期到我家一两次,你毫不感到羞耻地带他参观我们的两间半房间,你又很乐意谈到内在的财富比外表的更重要,这就使我的小心灵陷入不安和不明确中。维克托答应我们许多事情:他能够为你组织一些报酬更好的音乐会,能够在一些有势力的经理和副经理面前为你说话;照他的说法,我的父亲应该得到一个更好的职位。他的饶舌使我感到不安,也许是因为他不肯讲些我能理解的事情,实际上,他没有

花什么气力来争取我的同情。维克托同我家田园诗似的关系只持续了三四个月。有一天,为了据他说是十分重要的奔走活动,他向我的父亲借了一笔钱,我觉得数目极大,是六七百保加利亚货币单位列弗,换句话说,按照我的算法,足够看十五场电影的钱。之后有好几个星期不见他的踪影,我注意到你对我的热情又恢复了,这使我对维克托的不信任感又增加了许多,一天晚上我的父亲在饭桌上用坚定不移的冷酷态度说:

“这家伙永远不能再踏进我家一步。”

你没有吱声,可是我注意到你喝汤时每一口都很难下咽。按照习惯你会很快地暴跳如雷或者破口大骂,但是你却古怪地保持沉默。

几天以后,我被强烈的口角声惊醒。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我总躲在门后面偷听,这一次我却把头埋在枕头下面。第二天,你的额头上多了一个浅浅的刀痕,我得出结论说我的父亲打过你了,奇怪的是,我模模糊糊地可怜的是他,他一定是忍受过许多痛苦,才到了这种地步。我觉得我生平第一次做了一件特殊的事:我抑制住我的好奇心,将困扰着我心头的疑问全部驱赶,不作解答。我由此而得出一种负罪感,这种感觉在我身上延续了整整一星期。我责备自己不应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我的双亲经历过的悲剧,即使悲剧是由他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我的父亲延长了办公时间,你埋头拉小提琴一直到深夜;你们不是真的互不理睬,有时也说几句话。我自己也作出了决定,虽然是有矛盾的矛盾:我要请求我的父亲教我中世纪的历史,给我讲讲拜占庭,告诉我谁是凯撒,谁是俄国的亚历山大二世;同时我还要请你给我解释音符之间的分别,

请你给我说清楚从前在敖德萨时你的老师莱奥波德·奥埃尔教你些什么。这样,就会使你们两人分了心,家庭争执就减轻了紧张程度。

我不需要实施我的计划了。一天下午,我的父亲正在银行上班,维克托突然闯进我们家里。你奔上去抱住他的脖子,他搂着你的腰。你严厉地吩咐我不要动,然后你不作任何解释就出去了。两个钟头以后,你回来了,你的脸上既充满幸福,又有点慌乱。我的父亲马上就要回来;我觉得你害怕我会多嘴泄露秘密,可是你又不能充分控制自己,要求我当你的同谋,或者威吓我,要我不提你的离家外出。我和你之间有某些东西破裂了,我们两人的自发行动必须重新安排,而且允许妥协和考虑。你不再居住在我的小天地中,你飞向别的男人的广阔宇宙,到那一切都是饱含敌意的,严肃的,复杂的地方,我会因此感到痛苦吗?我有相隔一段距离的感觉,我到别处而不是到你身边找寻短暂的保护:我同街上的伙伴们玩得更起劲了,我甚至同年纪比我大的儿童说话。我理智地带着悲伤,去争取别人的同情心。

造房子和捉迷藏游戏妨碍了我获悉这幕家庭悲剧的结局,很可能在以后几年的岁月里,我的想象力扩大了这一幕的规模和增加了夸张的成分;也很可能,恰恰相反,你生平的这件大事从我眼皮底下溜过去了。以后别的忧思,别的变故,别的令人兴奋的事接踵而来,我那年纪正是自视甚高的时期,根本不知道将就一下我自己干的蠢事。而你呢,三十五岁,你肯定学会了克制,更加讲道理,甚至更加虚伪。在我看来,心理学始终是想象力最有力的竞争者,心理分析——有时我过分应用这种方法——会使自己化成无用和怪异的形象。总之从